

摘要

歐錫富、黃宗鼎

自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（以下稱「十九大」）以來，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黨中央，為深化黨對政軍體系與人員思想的控制、實踐習近平個人的「中國夢」，強勢啟動各項政治與軍事改革。與此同時，中國對外關係進入盤整，內部壓力也持續攀升。

「習核心」與毛澤東、鄧小平兩代領導中心主要之差異，在於「習核心」之權力體系概由法制所構築。自「十九大」以來，中共透過制度設計與法律配套，俾使習近平獲致絕對之權威與正當性，並藉由人事汰補，致「習核心」愈趨鞏固。「習核心」的動向與影響，大抵反映在習近平於黨政上的集權作為、對內重要之調研行程，以及「習思想」的政治宣傳等三大面向。儘管「習核心」將「防範化解重大風險」、「精準脫貧」、「污染防治」等社會問題做為「三大攻堅戰」的目標，但是否能解決中國社會因經濟趨緩、維權挫折，乃至於以中美關係緊繃而肇生的陳抗問題，尚須時間觀察。

習近平的軍改主要有保衛國家海外利益、軍事技術創新不斷湧現、防止反對勢力反撲、建立習個人絕對領導等四大背景。習近平推動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責任制，旨在強化對軍權的絕對控制。至於習近平的軍改內容，主要包括：一、確立「軍委管總、戰區主戰、軍種主建」原則的脖子以上改革（大腦指揮系統）；二、推動組建軍級、集團軍級單位、調整省軍區領導體制、改革武警等脖子以下（肢體體制編制）的改革，及三、建設聯合作戰與全域作戰能力等面向。總之，中共軍改企圖將軍隊從國土防衛型轉向對外進攻型，尤其強調聯合作戰與全域作戰，企圖在 2020 年達成初步成果。一旦解放軍增強新型作戰力量，台灣首當其衝，所受影響最大。

又中國為推行銳實力，有直接透過公權力或官方組織來攫取利益的方式，例如政治報復、強制企業技術移轉、公開威脅外國人民或企業遵守「一個中國原則」等手法；亦有間接透過代理人進行的方式，即透過威脅、利誘等手段吸收代理人，責其進行政治收買、情報蒐集、竊取技術、製造假新聞等活動。近幾年中國對台銳實力之應用，則包括培養代理人從事諜報情蒐及統戰、取得台灣高科技半導體技術、透過外資包裝投資台灣國安產業、報復違反「一中原則」的台商及藝人、以學術交流名義進行統戰、打壓特定宗教團體等。至於 2018 年中國對台銳實力之作為，主要集中在強迫國際航空公司及企業更改台灣名稱一節。而中國透過「一帶一路」對外輸出「中國模式」的行為，亦引發諸如「五眼聯盟」(Five Eyes, FVEY) 等國際組織的警覺與反制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目前中國軍力正由第一島鏈朝向第二島鏈發展，以實質掌控西太平洋地區。中國擴大在區域的軍事活動，旨在以實戰訓練熟悉周邊戰場環境、頻繁展示軍力以爭取戰略主動權、建立區域軍事優勢拒止外軍介入，及藉由非傳統安全任務擴大海外軍事連結。面對中國軍力擴張，美國、日本、澳洲、英國、

法國等國家均強化關注，並展開戰略調適及軍力部署。如美國提出印太戰略，宣示將重塑軍事整備，冀以現代化維持軍事優勢；日本則持續強化島嶼防衛，提升與區域國家之軍事合作。

2017年5月，中國藉由《共建「一帶一路」：理念、實踐與中國的貢獻》文件提出了「六廊六路多國多港」的國際合作框架。隨著中國影響力的擴張，前述經濟走廊以外的地區，也逐漸被納入了「一帶一路」戰略。中國固然得以透過「一帶一路」緩解內部產能與資金的過剩問題，惟據以突破地緣政治困境、帶動其國內開發，更是中國主要目的。中國雖創設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，藉以修正「一帶一路」缺乏統籌且政出多門的亂象，但包括與沿線國家利害衝突、與大國博弈之際淪為眾矢之的、整合不易、民心未通、債務陷阱及內部風險等問題，反成為中國負面資產，不利於「一帶一路」後續發展。